

# 比利時民粹極右翼政黨與反移民：以 法蘭德斯利益黨為例

##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y and Anti-Immigration in Belgium: The Case of Vlaams Belang

劉華宗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Hua-Tsung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hua University

E-mail : ted0310.liu@gmail.com

### 摘要

本文內容主要有四大部分。首先，定義民粹主義是一個薄形的意識形態，並且是種特別的政治溝通形式。其次，呈現法蘭德斯集團（或利益）黨的反移民論述與事例。再者，探討法蘭德斯集團（或利益）黨受「防疫線」影響，導致政黨的發展與衰退，以及「防疫線」所產生的吊詭現象。最後，針對法蘭德斯利益黨在 2019 年選舉中，如何突破「防疫線」30 年的孤立，在政黨走下坡後的趨勢中再度崛起，提供分析觀點。

**關鍵字：**民粹極右翼政黨、反移民、法蘭德斯利益黨、比利時、防疫線



**Abstract:** This paper is structured into four main sections. First, populism is defined as a ‘thin’ ideology and a specif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yl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y is a populism combined with radical right party to adopt positions on anti-immigration. Second, it presents anti-immigrant theme of VB (Vlaams Blok later renamed Vlaams Belang) through discourse. Third,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VB are partly shared by the fact that has been excluded from power by means of a *cordon sanitaire*. Finally, it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how to explain the return of Vlaams Belang, isolated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from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Keywords :**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y 、 anti-immigration 、 Vlaams Belang 、 Belgium 、 cordon sanitaire



## 一、前言

比利時於 2018 年 10 月舉行省與基層自治區的地方選舉，<sup>1</sup>選舉結果新法蘭德斯聯盟(Nieuw-Vlaamse Alliantie, N-VA)維持在法蘭德斯地區最大黨，<sup>2</sup>但和 6 年前地方選舉結果相較少了 3.7%得票率，荷語基民黨、荷語自由黨則分別少了 1.8%及 0.9%，但荷語綠黨、法蘭德斯利益黨(Vlaams Belang, VB)則各增加 5.5%、4.1%得票率，後兩者雖分居第 4、5 大政黨，但和第 3 大黨荷語自由黨相差甚微，後 3 者都有 13%以上的得票率（參見表一）。法蘭德斯利益黨和新法蘭德斯聯盟系出同源（劉華宗，2018：137-152），政策立場相近，只是前者比後者立場較為激進，在選舉競爭場上兩者經常呈現消長替代關係。法蘭德斯利益黨的選票增加，使新法蘭德斯聯盟心生警惕，必須在反移民立場上採更強硬立場，以免在翌年的 3 合 1 選舉中失利。

表 1 2012 及 2018 年地方選舉，法蘭德斯地區主要政黨得票率

|                   | 2012 年地方<br>選舉 | 2018 年地方<br>選舉 | 增減率   |
|-------------------|----------------|----------------|-------|
| 新法蘭德斯聯盟<br>(N-VA) | 28.5%          | 24.8%          | -3.7% |

<sup>1</sup>比利時選舉約可分為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聯邦(Federal)、地區(Regional)及地方(Local)選舉共 4 類（劉華宗，2019：78）。2018 年舉辦的是第 4 類，2019 年舉辦的是前 3 類。

<sup>2</sup>比利時原有基民黨、自由黨及社會黨為全國性政黨，因 1968 年魯汶大學分裂事件，導致基民黨在 1968 年、自由黨在 1972 年、社會黨在 1978 年沿著語言疆界分裂為二（劉華宗，2009：20）。聯邦化之後，次聯邦體制有明確的權限劃分，除了布魯塞爾-哈爾-維爾沃德選區有荷、法語政黨競爭外，其他基本上是荷語政黨在法蘭德斯地區競選，法語政黨在瓦隆尼亞地區競選，國會議席數是依荷、法語人口比例去分配。



|                    |       |       |       |
|--------------------|-------|-------|-------|
| 荷語基民黨<br>(CD&V)    | 21.5% | 19.7% | -1.8% |
| 荷語自由黨(Open<br>Vld) | 14.6% | 13.7% | -0.9% |
| 荷語綠黨(Groen)        | 7.7%  | 13.2% | 5.5%  |
| 法蘭德斯利益黨<br>(VB)    | 8.9%  | 13.0% | 4.1%  |

國會最大黨新法蘭德斯聯盟，因反對總理米歇爾(Charles Michel)簽署《移民問題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2018年12月8日退出執政聯盟，使比利時內閣垮台成為看守內閣。<sup>3</sup>2019年5月26日國會3合1選舉結果出爐，新法蘭德斯聯盟雖仍維持最大黨，但和5年前選舉相較，在法蘭德斯得票率下降7.06%成為24.83%，反而是法蘭德斯利益黨選票大幅增長，得票率增加12.58%成為18.50%，躍升為荷語區第2大黨，是此次選舉的最大贏家。

法蘭德斯利益黨的前身是法蘭德斯集團黨(Vlaams Blok, VB)，成立於1978年，1980年代中期後以反移民立場著稱，選票開始成長。在1989及1992年兩次民主政黨聯合簽署協議，對法蘭德斯集團黨設下「防疫線」(*cordon sanitaire*)，<sup>4</sup>也

<sup>3</sup> 2014年國會選舉席次最多的5大政黨分別是：荷語新法蘭德斯聯盟、法語社會黨、荷語基民黨、荷語自由黨及法語改革運動黨；扣除法語社會黨，聯合內閣由其他4黨組成。法語改革運動黨黨揆米歇爾雖出任內閣總理，但它卻是內閣中唯一法語政黨、也是最小政黨；因此，當立場偏右翼的新法蘭德斯聯盟撤離支持，隨即面臨內閣垮台(劉華宗，2019：72)。

<sup>4</sup> 1989年5月10日法蘭德斯5個民主政黨主席共同承諾，拒絕與法蘭德斯集團黨合作，不過僅40餘天就被人民團結黨(VU)黨主席給破壞，他認為法蘭德斯集團黨是應該要符合政治鬥爭規範，但也不應該用全部反對一個的協議方式封殺對方。由於法蘭德斯集團黨在1991年國會選舉大有斬獲，並且在1992年6月正式推出內容詳實完整的反移民政策，同年11月19日所有民主政黨在國會集會，基於反對種族歧視主義以及要維護民主體制，再度簽署協議對法蘭德斯集團黨設下「防疫線」。「防疫線」



就是沒有一個民主政黨會和法蘭德斯集團黨這樣強烈種族主義政黨，在任何議題和任何層級政府與之聯合或合作，嘗試限縮後者的政治影響力與選票成長。法蘭德斯集團黨因為長期仇外、具種族主義立場，2004年遭法院判決違法，迫使其改名為現今的法蘭德斯利益黨，否則將不能獲得政府經費補助及在電視頻道播出(Brems, 2006:702-725)。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是立場鮮明的反移民政黨，然而主張反移民的政黨是否就一定是單一議題的政黨？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經常被學界稱為極右翼政黨(Mudde, 2000; Coffé, 2005a; Coffé, 2005b; Erk, 2005)或民粹極右翼政黨 (Pauwels, 2011a; Pauwels, 2011b:114; Mudde, 2013:3)，是因為主張反移民議題的關係嗎？

「防疫線」僅能阻隔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進入聯合政府、分享政治權力，並無法阻止政黨的成長。在20世紀末法蘭德斯集團黨選票不斷成長，到了21世紀初2004年達到高峰，之後開始逐步走下坡，到了2014年達到谷底（參見圖一）。學者曾以2009年的調查資料分析，認為「防疫線」使得法蘭德斯利益黨成為永遠的反對黨，選民在有較佳的替代選擇情況下，將會產生棄保效應，以免浪費選票(Pauwels, 2011a)。法蘭德斯利益黨就在學者(Downs, 2019)不看好的情況下，於2018年的選舉中選票逐步回升，2019年的選舉更是一舉拿下法蘭德斯第2大黨，全國第3大黨。如何解釋法蘭德斯利益黨的重新復活？在「防疫線」封鎖的情況下，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又如何看待前者對其選舉的影響？政黨是否想突破「防疫線」封鎖成為聯合政府的一員？

---

就此被延用到現今，除了基層自治區偶有少數例外，在全國及地區層級與大城市基本上都維持此一政治傳統。由於簽署2次，因此學界或輿論在談「防疫線」的起始年份，會出現2個不同的說法(Jacobs and Swyngedouw, 2002:333; Coffé, 2005a:213; Coffé, 2005b:76; Brems, 2006:703; De Cleen, 2013:211; Pauwels, 2013:96; Rihoux et al., 2014:4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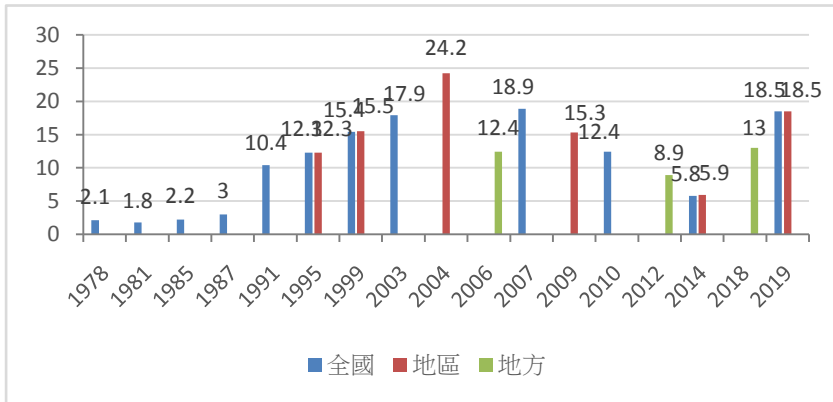


圖 1 法蘭德斯集團（與利益）黨歷年重要選舉於法蘭德斯的得票率走勢圖

本文以下將分幾部分予以探討。首先，何謂民粹極右翼政黨，民粹主義的定義為何，民粹主義是否一定就是極右翼立場，極右翼政治立場是否一定主張反移民？其次，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的主張與論述為何，與反移民立場的關係為何，對其政黨發展是否有所影響？再者，「防疫線」使法蘭德斯集團黨成長茁壯、也使政黨發展受到阻礙，探討「防疫線」對該黨發展與民主政治產生的弔詭現象，以及該黨努力突破封鎖所做的各項努力。最後，嘗試解釋法蘭德斯利益黨如何在今年選舉中重新突圍，以及「防疫線」對政黨發展的限制與該黨面臨的困境。

## 二、民粹極右翼政黨的定義與內涵

民粹主義一詞的使用，經常導致困惑，關於概念的定義也有許多爭辯，還未獲公認的定論(Stanley, 2008:100; Van Kessel, 2014:100)。依據 Taguieff(1998)從許多歷史整理出來的文獻，可以區分出有連續三波的民粹主義：農民的民粹主



義、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及新右派的民粹主義。農民的民粹主義，始於 19 世紀下半葉，由俄國民粹派知識份子所提出，以代表俄羅斯農民利益，從事平等主義的鬥爭；同時，在世紀交替前的美國人民黨，誓言反對資本主義，以及照顧農民社會經濟的利益，這些都被認為是農民民粹主義的代表。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興盛於 1940、50 年代的威權政體，包括阿根廷的裴隆及巴西的瓦加斯這些民族主義者、具有領袖魅力的領袖，假裝成是民眾的直接解放者，其統治作為是為了人民以反抗建制派利益。新右派民粹主義者，從 1970 年代開始，動員民眾反對「自肥、長期忽視民眾真正需求」的傳統政治；新右派民粹主義典型的將關注焦點放在移民、賦稅、犯罪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從前述三波民粹主義可歸納出三個共通點：不斷提及民眾，藉由訴求與認同民眾，以合法化其行動；是植基於反菁英的情感；以及認為民眾是單一統一性團體，沒有內部的差異性 (Jagers and Walgrave, 2007:321-322)。

Mudde 也認同學術界對於「民粹主義概念的澄清與定義的共識」並沒有較接近的看法，只有在菁英(the elite)和民眾(the people)兩名詞稍微有些共通點。換句話說，民粹主義通常是指菁英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但民粹主義究竟是一種意識型態、綜合症狀、政治運動或政治形態？仍留下一些謎團。他本人對民粹主義的定義如下：它是種意識型態，社會可被分為兩個同質性且又敵對的團體，「純粹的民眾」(the pure people)與「腐敗的菁英」(the corrupt elite)，並且政治應該被用來表達民眾的公共意志 (volonté générale)(Mudde, 2004:543)。Stanley 則歸納民粹主義有以下四項特徵：1.存在兩個同質性的分析單位，民眾與菁英；2.民眾與菁英之間的敵對關係；3.民眾主權的觀念；4.對民眾持正面穩定的看法，菁英則予以貶抑(Stanley, 2008:102)。Mudde 並且表示，民粹主義雖是個可區別的意識型態，但它並不像社會主義或自由



主義，有那麼多知識上的完善與一致性；民粹主義僅是以薄為核心(thin-centred)的意識型態，其有限的核心是附屬於另一狹義的政治觀念。民粹主義的核心概念很明顯就是「民眾」；從某種意義來說，甚至菁英概念可說是來自於民眾對立面的認同。作為一個以薄為核心的意識型態，民粹主義能夠很輕易和非常不同（薄且完整）的其他意識型態相結合，包括共產主義、環境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Mudde, 2004:544)。Jagers and Walgrave (2007:322-323)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行為者溝通的方式，以及作為動員的策略，而不是意識型態。Van Haute et al.(2018:956)則認為前述兩者並非是必然不能相容的。本文則認同兼採兩者的觀點，亦即民粹主義作為以薄為中心的意識型態是可以和其他意識型態相結合的，同時民粹主義也是一種動員民眾支持的策略，以及與選區民眾溝通的方式。

關於極右翼政黨，Art(2013:130)的定義為這些政黨視族群差異為基本的、永遠不變的、以及具有潛在破壞政治生活的特質；它們對這些議題所採取的立場，使得它們位於主流保守競爭者的右方位置。西歐極右翼政黨對政治文化面向的關注，是以犧牲經濟面向為代價，這使得它們對移民所採取的立場，比那些主流保守競爭者更嚴格。而民粹極右翼政黨，即是民粹主義以薄中心的意識型態，結合極右翼意識型態的政黨，針對反移民等相關議題提出政策和主張，透過政治溝通形式訴諸民眾、動員民眾。

大多數民粹極右翼政黨出現在 1980 年代建制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其基本形式為民粹主義被設計來動員民眾，作為一種政治勢力以反抗「既有的權力結構及支配社會的觀念與價值」，意圖在貶抑政治建制派的價值，並且以「民眾的共識」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新基礎。民粹主義被設計來開發民眾怨憤的情感(feelings of resentment)，並且在政治上充分利用他們，強迫政治建制能聽取他們的需求(Betz, 2002:198-202)。





法蘭德斯集團黨利用法蘭德斯人對瓦隆尼亞人的怨憤即是此例。

民粹極右翼政黨有能力利用民眾怨憤，可以解釋它們在民調上一開始的成功，但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些政黨能夠長期表現得很好、有些卻不能。民眾會長遠支持一個新的政黨，必須和特殊議題有關聯性，並且該政黨被視為是有能力的。對民粹極右翼政黨而言，有關政策能力的主要議題是反移民，其所表達和訴求的是民眾「怨恨移民及政府的移民政策」。

法蘭德斯集團黨剛創立是立場鮮明的法蘭德斯民族主義者，主張政府權力分權化、法蘭德斯要走向完全獨立。在1987年以後，開始明顯朝向移民議題。根據 Billiet and De Witte(1995:193)分析法蘭德斯集團黨在1991年的競選政見，最主要的議題是「對移民充滿負面態度」。Maddens and Hajnal(2001)進一步研究發現，1991及1995年選舉可說是接近單一議題，焦點全在移民議題上。Art(2008:428)也發現在1999年的選舉，投票給法蘭德斯集團黨的選民有4%是因為民族主義運動，27%是因為移民問題。根據 Walgrave and De Swert(2004:486)的研究，移民和犯罪議題是法蘭德斯集團黨在1990年代選舉成功的重要因素。Poznyak et al.(2011:684)也發現1991至2003年選舉，移民議題是影響法蘭德斯集團黨的重要議題。Schuermans and De Maesschalck(2010:258)在探討極右翼政黨為何能在法蘭德斯鄉下地區獲勝，發現政黨操縱種族主義與對移民的恐懼感，使農村與近郊居民對移民者與罪犯劃上等號，害怕鄉下地區會像大城市一樣成為下一波受害者。儘管很多鄉下地區移民者數量很少，但恐懼感卻未降低，Hooghe and De Vroome(2015:52)發現，媒體使用時間愈多，愈容易有錯誤認知，以為比利時即將被移民者的浪潮給淹沒，反移民的情感也較強。Boonen and Hooghe(2014:62)針對法蘭德斯利益黨與新法蘭德斯聯盟的選民做投票行為比較，發現反移民情緒是前者投票支持的主要驅動力，但後



者卻不是。事實上，Filip Dewinter 在 1992 年 6 月正式提出並出版《70 點政綱》(programme of 70 points)，同年底比利時民主政黨就再簽署「防疫線」協議，一直到 2004 年政黨被迫改名，直到現在「反移民」一直是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最鮮明的標幟，因此本文以反移民的政策主張與論述內容作為研究主軸。

至於反移民的政黨，是否就是單一議題的政黨？是否就是極右翼政黨？根據 Van Spanje 的研究，反移民政黨並非就只是關注單一議題；實際上，他們是以更廣泛的意識型態考量作為基礎(2011:306)。法蘭德斯集團黨雖是個反移民政黨，但犯罪、移民整合、法治及法蘭德斯民族主義都是其關切的議題，並且可以說都是從移民議題衍生相關的。至於反移民政黨是否等同於極右翼政黨，在同個研究中有 12 個個案，其中有 9 個反移民政黨符合極右翼政黨的標準，另外 3 個不符合，因此學者認為兩者並非是完全相同的(Van Spanje, 2011:316-319)。

### 三、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與反移民

本節分兩部分論述分析，先述敘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有關反移民的政策、論述與事例，其次再討論反移民對政黨所產生的反作用與影響。

#### （一）、反移民議題的相關論述與事例

人民團結黨(Volkunie, VU)參與 1977 年艾格蒙特協議的簽署，以促使比利時朝向聯邦化方向發展；黨內強硬派份子對於向法語人士讓步過多，感到憤怒並進而脫黨出走，在 1978 年組成法蘭德斯集團黨。黨主席 Karel Dillen 指出，該黨是一個激進的政黨，「強硬、不妥協，總是監督著其他政黨的缺點，本身則不受任何誘惑吸引」。在剛成立的前幾年，以民族主義訴求為中心，為法蘭德斯的獨立而努力，希望能



成立法蘭德斯共和國，以布魯塞爾為其首都。但比利時自 1970 至 1993 年，正是從單一國家轉變成聯邦國的修憲期(劉華宗，2017：89-90)，荷、法語政黨對於聯邦權力如何移轉到次聯邦體系吵得不可開交，荷、法語族群關切焦點也在分權化，對於法蘭德斯集團黨主張獨立訴求未有太大迴響，反映在選舉結果就是在 3% 以下的得票率。

讓法蘭德斯集團黨選票有所突破、甚至成長，是在改採反移民策略之後，而法蘭德斯集團黨則是受法國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反移民策略成功所啟發。民族陣線藉由譴責執政當局無法有效解決國內失業與社會治安問題，將矛頭指向外國移民是罪魁禍首，因而在 1984 年歐洲議會選舉及 1986 年法國議會選舉中大有斬獲。

比利時社會也存在著移民問題。二次大戰後，比利時制定外籍移工方案以幫助煤礦產業復甦；從 1946 至 1974 年允許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移民勞工，自 1964 年起摩洛哥與土耳其國籍的移工也被允許引進。在 1974 年比利時正式停止任何無技術勞工移民。然而至比利時的移民卻從未停止過，主要可分以下幾種類型：第一，歐洲公民的流動，這是合法允許的；第二，家庭團聚，外國人只要是合法定居於比利時，有權利攜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第三，每年給外國來此求學的學生暫時性居住；第四，政治避難申請者；第五，特殊類別的外國勞工，每年有權利來比利時工作者。這使得比利時人口變得多樣性，穆斯林也變得相當多(Martiniello, 2003:225-227; Martiniello, 2012:68-69)。法蘭德斯集團黨認為，太多的移民使法蘭德斯人正在失去這個國家，社會治安、失業問題也都和移民脫不了干係，因此必須嚴肅看待，予以徹底解決。

在 1984 年 3 月 25 日布魯塞爾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的國際日，法蘭德斯集團黨第一次舉辦有意識型態導向的會議，致力於討論「外籍人士的問題」(foreigner problem)。之



後，Karel Dillen在比利時眾議院提交的第一個法律草案，就包括提供現金誘因給移民者，使他們願意返回自己原先的祖國；雖然未成案，但也開啟該黨逐步重視移民議題。在1984年歐洲議會選舉，法蘭德斯集團黨提出的競選口號2號「我們說你們現在正在想的」<sup>5</sup>(We say what you are thinking)；把移民帶來的壓力及高失業率問題結合在一起，希望衝擊民眾去思考其受影響部分，把票投給他們，讓他們可以真正代表民眾心聲發言。

法蘭德斯集團黨選票的突破是在1987年國會選舉，該次競選口號相當清楚：「法蘭德斯人優先」(eigen volk eerst; our nation/people first)，並指出比利時國內有「五十萬人口失業，為什麼還需要外籍勞工？」(500,000 people unemployed - why need foreign labor?)主張應該將來自北非及土耳其籍的移民，送回原先的祖國(Bouveroux, 1998:210-211)。這裡的「五十萬人口失業」，很清楚的指的就是比利時的一般「民眾」，而「為什麼還需要外籍勞工」則是清楚的表明「反移民」立場，唯有法蘭德斯人優先就業，才能解決失業等社會問題。該次選舉結果，法蘭德斯集團黨獲法蘭德斯3%得票率，從在參議院0席、眾議院1席，變成參議院1席、眾議院2席。

1991年11月24日國會選舉，主要政黨選票滑落，法蘭德斯集團黨再度有所突破，獲法蘭德斯10.4%得票率，與上次選舉相較成長7.4%，極右翼政黨的崛起，該投票日被稱為「黑色星期日」。該次選舉的特色，法蘭德斯集團黨對移民所採取的負面態度，成為其勝選的最大因素。法蘭德斯集團

---

<sup>5</sup>學者表示，該句競選口號是有深意的。法蘭德斯集團黨不是只代表民眾表達一般看法(opinions)而已，而是**敢於(dare)**說出令人覺得**不愉快的事實(unpleasant truths)**，此指當時移民造成社會充斥著穆斯林與多元文化主義。法蘭德斯集團黨認為，事實存在於一般民眾心中，而該黨是敢於表達及呈現事實於政黨政治領域的唯一政黨(De Cleen, 2016:236)。亦即，其他政黨可能也知道、也不喜歡穆斯林充斥，但卻沒有道德勇氣發聲表達反移民的立場。



黨提出一個很明確的烏托邦願景，一但「移民」全部消失，所有事情將會好轉；該黨為了迎合「民眾」新價值，包括：安全、秩序、傳統價值、就業等等，提出移民既是個威脅，更是所有問題的直接原因(Swyngedouw, 1992)。也就是透過溝通方式，訴諸民眾，傳達反移民政策與立場，並描繪未來沒有移民的美好願景，最後再動員民眾投票支持。

法蘭德斯集團黨在突破 1991 年全國選舉後，翌年 6 月 Filip Dewinter 出版了一份《70 點政綱》。內容包括：所有移民者強制遣返並且擴及到第三代、教育上的種族隔離、以及社會安全體系的切割；社會安全體系對移民者有較高的收費，以作為將來支付遣返他們的費用基金；以及許多法治問題的探討(Erk, 2005:496)。《70 點政綱》是該黨認為可以解決移民問題的指南，尤其對非歐洲移民者應完全禁止，並且運用「我們自己民眾優先」的原則在所有政策領域；對於那些沒有工作、有大家庭要養或生活在社會住宅的，則列為第一批要遣返者；為了維護法蘭德斯認同，提供我們自己民眾優先原則的適用，加速遣返外來者至全面暫停移民，並且制定更嚴格規範以打擊罪犯和非法移民。《70 點政綱》在 1996 年被修正，新的版本軟化政黨激進的立場，藉以提高同化非歐洲移民者的可能性。2000 年《70 點政綱》遭摒棄(Coffé, 2005a:207-210)。在 2003 年 Dewinter 接受 De Standaard 報紙訪問時承認，《70 點政綱》是有些過時、不再實際可行了，立場也有所轉化，「但不會轉變太多，因為我們獨特的賣點仍然是對移民、安全、法蘭德斯獨立，有清楚明確的立場」。亦即立場調整為強調同化，「適應，否則回去」(adapt, or turn back)成為新口號，對於那些不想要適應、融入法蘭德斯社會與文化的人來說，遣送回去仍然被視為是必要的。

法蘭德斯集團黨視族群多元主義(ethnopluralism)為其意識型態的重要部份，即不同民族之間存在著永久性的差異，以及不同族群民眾應該生活在自己的團體之中。因此該黨認



為「就像法蘭德斯人生活在沙漠中有其困難，同樣的北非穆斯林生活在當代複雜的法蘭德斯社會有其困難」(Mudde,2000:100)。該項主張的繼續衍生，「由於移民者是根植於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發現自己無可避免的會捲入吸毒與犯罪等所有問題；移民者為了他們自己本身的好，因此應該遷徙離開法蘭德斯這塊土地，這樣他們就可以根據自己的本性繼續生活、並且生活的很好」(Pauwels, 2014:102-103)。法蘭德斯集團黨在 2005 年之前，利用民粹方式在種族及反建制議題上，獲得相當大的成功。其強烈意識型態的文字，後來由於受到司法起訴的壓力及現實務實的考量，雖皆經過潤飾與改寫，但仍出現相同的「反移民」及「仇外」心態。它將犯罪與移民做了聯結，街頭犯罪、運毒、汽車竊盜、賣淫、街頭搶劫、居家強盜，都被歸罪於外來的青少年與幫派份子，東歐二代及三代與穆斯林移民也都被認為涉入犯罪(Coffé,2005b:77)。

法蘭德斯集團黨於 2004 年底改名為法蘭德斯利益黨，黨綱雖有做調整，反移民、仇外、種族主義的立場有更緩和，至少符合法律規範，但反移民的態度卻未有太大的調整，甚至遊走法律邊緣。Dewinter 於 2005 年曾說「多元文化主義導致多元的犯罪」，顯示他對伊斯蘭教恐懼症與反感的立場從未改變，「任何伊斯蘭教婦女只要外出戴頭巾，將會因此成為她被遣返的正當理由」(Moufahim and Humphreys, 2015:88)。2009 年的地區選舉，法蘭德斯利益黨採用相對極端、偏頗的競選口號，「你的退休金、養老金到那裡去了？在穆罕默德的口袋裡(Where is the money of your pension? In the pocket of Mohammed!)」(Pauwels, 2011a:67)。強調穆斯林花掉了比利時太多的社會福利經費，使法蘭德斯人的負擔更重、福利減少，也是直接訴諸民眾，立場明確的反移民、反穆斯林。

法蘭德斯利益黨為了證明本身致力於保護法蘭德斯文化、反移民，該黨在 2010 年上半年競選廣告，以挑釁方式



問選民，為什麼要投票支持該黨。廣告內容刊出在三個大的告示牌上，分別用法文、中文及阿拉伯文問選民「為什麼要投票支持法蘭德斯利益黨？」隔段日子再使用三個相同告示牌回答問題：「因為我們在保護法蘭德斯人。」根據 Dewinter 所說，法蘭德斯利益黨使用三種語言，把焦點集中在法蘭德斯「目前所出現的問題上」。使用阿拉伯語是要指出比利時因為過多移民導致嚴重的伊斯蘭化，用法語是要指出瓦隆尼亞堅持比利時聯邦體制導致政治僵局，以及用中文是要指出法蘭德斯工作減少，是因為像中國等低工資國家所致(Duerr, 2015:41)。

隨著法蘭德斯利益黨選票下滑，和新法蘭德斯聯盟的選舉競爭愈趨劇烈，為了有所區隔並突破近年來選舉失利，法蘭德斯利益黨決定在其反移民部分採更激進的策略。在 2012 年地方選舉前一個月，Dewinter 出版《移民--入侵：新殖民》(Immigration-Invasion: The New Colonisation)一書。該書主張，大規模移民產生犯罪、貧窮與失業；並宣稱「相當多的移民從他們剛出生包尿布時就帶著一把刀」；移民使法蘭德斯付出大量的金錢成本，並且開啟伊斯蘭教殖民歐洲的大門；伊斯蘭教代表不能容忍、性別主義者、欺騙、反民主及中古世紀 (Intolerant, Sexist, Lying, Anti-democratic and Medieval)(Pauwels, 2013:90-91)。2014 年 5 月國會選舉前，Dewinter 策劃一個電玩遊戲，名為 Less-Less-Less，遊戲者能不斷打擊「穆斯林恐怖主義者」以及當時的首相迪賀波(Elio Di Rupo)，他們所呈現的就如卡通中的飛機一樣，是被攻擊的目標。該電玩遊戲在 2015 年 2 月被視為是一種族主義，必須從網頁上給移除。此外，在 2015 年的 1 月 Dewinter 譴責古蘭經，說它是「禍害的根源，邪惡的來源，及殺戮的特許」，當他在國會開會時還舉起那副本做說明(Van Haute and Pauwels, 2016:54-55)。另外在一個訴諸年長者婦人的競選小冊子，則是反猶太主義，有類似召喚納粹野蠻落後的論調出



現。「我被暴力反以色列的遊行給嚇到。所有這些要求聖戰，以及口喊『哈瑪斯，哈瑪斯，所有猶太人都要關進毒氣室』。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這令我質疑要給外來者投票的權利」(Moufahim et al., 2015:101)。

由上述論述與事例，可以清楚看出不論是法蘭德斯集團黨或法蘭德斯利益黨，對於反移民的立場與態度，是相當堅定與一貫的，它讓該黨從小派系政黨，逐漸發展成法蘭德斯第2大政黨。然而，反移民策略真是百利無一害嗎？接下來將談它所產生的反作用力現象。

## (二)、反移民的反作用力與影響

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的反移民策略，透過直接溝通，訴諸民眾對穆斯林的排斥與恐懼感，進而動員民眾支持，的確為其帶來選票與政黨成長，然而也帶來三個反作用力與影響，1.分別是黨內路線之爭，陸續有派系出走；2.導致其他民主政黨聯合抵制，產生了「防疫線」的圍堵策略，使其無法分享政治權力；3.政黨污名化的烙印，以及被迫改名再出發。關於「防疫線」議題，由於影響深遠，涉及的內容較多較廣，將再後文特別討論。

法蘭德斯集團黨剛成立之時，以民族主義者自居，訴求法蘭德斯獨立成立共和國，因此黨內成員多數都是民族主義份子。然而，民族主義賣相不佳，黨的成長有限。1987年以反移民策略打響第一砲，黨內年輕份子 Dewinter 等人深受極右翼思想及法國成功經驗影響，認為法蘭德斯集團黨就應該走「反移民」作為競選策略主軸。黨內於是有了民族主義派與反移民之 Dewinter 派的路線之爭。黨主席 Karel Dillen 經過一番思考，出於偏好選舉回饋考量，決定以反移民為政策主軸，但仍包括舊的民族主義理念。民族主義派認為黨背棄基本意識型態和理念，許多重要份子出走(Coffé, 2005a:209)。這是黨內的第一次路線之爭。





新法蘭德斯聯盟是人民團結黨分裂後的一支，和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可謂系出同源，走的也是民族主義路線一派，但政策與路線相對溫和許多，從 2004 至 2007 年一直和荷語基民黨成立競選結盟，2008 年分道揚鑣，2009 年開始以獨立政黨投入選舉活動，2010 年即成為法蘭德斯第一大黨。由於新法蘭德斯聯盟主席 Bart De Wever 極具有領袖魅力，該黨選票成長快速（劉華宗，2018：151-162）。法蘭德斯利益黨自 2008 年起由 Bruno Valkeniers 接任黨主席，<sup>6</sup>Valkeniers 並非是黨內重要角色，在媒體面前表現也不出色，他一切唯 Dewinter 意見是從，Dewinter 雖無黨主席之名，卻是最具影響力的黨內實力派人物。Dewinter 認為面對新法蘭德斯聯盟的挑戰，只有走向更偏激的反移民道路，才能如同 2004 年一般再創高峰。然而事與願違，法蘭德斯利益黨的選票不斷下降，到了 2014 年的 3 合 1 選舉再達谷底。從 2008 年起反對法蘭德斯利益黨再走激進路線的溫和派，在屢勸不聽、進言無效後，包括第二位黨主席 Frank Vanhecke，以及創黨主席的公子 Koen Dillen 等人紛紛出走 (Pauwels, 2013:95)。也就是說，反移民策略雖然幫法蘭德斯集團黨站穩腳步、甚至成長，但對於該策略的運用並非黨內意見一致、立場完全相同，甚至因為齟齬而分裂、出走。

法蘭德斯集團黨作為一個新的政黨，要在政治光譜上找到足以成長的立基點並不容易，反移民策略使其成為極右翼政黨。然而，要別出心裁走不一樣的路，就面臨鋌而走險的情況發生。法蘭德斯集團黨長期的仇外、反移民主張，2000 年 10 月「反種族主義與促進機會平等中心」和「人權聯盟」兩個反種族歧視團體向法院按鈴控告，指控和法蘭德斯集團

---

<sup>6</sup>如果把法蘭德斯集團黨和法蘭德斯利益黨視為本質不變的同一政黨，那麼成立 40 年的該黨，直至今日僅選出過 5 位黨主席而已，分別是 Karel Dillen (1979-1996)，Frank Vanhecke (1996-2008)，Bruno Valkeniers (2008-2012)，Gerolf Annemans (2012-2014)，Tom Van Grieken (2014-)，至於 Filip Dewinter 反而從未擔任過黨主席。



黨有密切關聯的三個非營利組織違反 1981 年的反種族歧視法。原告指控法蘭德斯集團黨 1997 年的政綱、1999 年的競選議題都有歧視內涵；受指控的章節內容，包括：對外籍人士小孩給予不同的教育體系，對僱用非歐洲籍移工的僱主特別課稅，以及對外籍人士的失業福利與小孩津貼嚴格限制等，基本上對外籍移民明顯給予差別待遇。2001 年 6 月布魯塞爾矯正法院、2003 年 2 月布魯塞爾上訴法院先後認為這非其裁判與管轄範圍。直到 2004 年 4 月 21 日根特上訴法院(the Appeal Court of Ghent)才判決，和法蘭德斯集團黨有關的三個組織違反 1981 年 7 月 30 日的反種族歧視和仇外法案；並且判決三個組織成員各罰款 12,394.67 歐元，以及法蘭德斯集團黨要賠償兩個原告單位 5,000 歐元。法蘭德斯集團黨提出上訴反對這項判決，認為反種族歧視和仇外法案，和比利時憲法第三條保障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兩者間存在著矛盾。2004 年 11 月 9 日比利時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判決法蘭德斯集團黨種族歧視違法，支持根特上訴法院的裁決(Coffé, 2005a:214-215; Brems, 2006:702-705)。

2004 年 11 月 14 日法蘭德斯集團黨(Vlaams Blok, VB)改名為法蘭德斯利益黨(Vlaams Belang, VB)，並調整了一些政策綱領；其反移民的基本立場不變，但稍微軟化仇外的態度，過去針對所有移民的強制遣返，改為針對「拒絕、否定政教分離、表達的自由、男女平等這些歐洲共同價值的人」予以遣返，基本上也就是針對穆斯林為主。這些反穆斯林的文字訊息，已經達到其所欲的目的，但也符合法律的規範。最高法院判決有效地迫使法蘭德斯集團黨解組、改名，及政策綱領的調整；否則，法蘭德斯利益黨將不能獲得政府經費補助，以及政黨將不能有在電視頻道上播出的權利，缺少政府的經費挹注與電視頻道的播出，這將會嚴重影響政黨的生存與發展，因此該黨適時的配合調整是必要的(Erk, 2005: 493-495; Brems, 2006: 702-705)。



2004年6月比利時舉行地區選舉，法蘭德斯集團黨不但未受4月根特上訴法院宣判結果的影響，反而因法院判決給了在媒體上的高能見度，該黨就像是建制政黨集體壓迫下的受害者，選票因而衝到有史以來的歷史高點24.2%得票率。乍看之下，法蘭德斯集團黨不但未受種族主義政黨標籤影響，反而是受惠，坐實建制派政黨是貪腐的一群，民眾則以實際行動相挺受迫害的政黨。然而，如果拉大、拉長歷史角度來看，實情似非完全如此。2002年選舉法修正，將先前選區廢止，改為以省為疆界的選區，並增設選舉門檻，然而具爭議性的布魯塞爾-哈爾-維爾沃德(Brussels-Halle-Vilvoorde, BHV)選區完全不做調整，引起法蘭德斯人民強烈的不滿，荷、法語族群衝突再起，2003年法院宣判選舉法違憲，必須在未來4年內予以解決。布魯塞爾-哈爾-維爾沃德選區劃分爭議的嚴重性，以及該議題在選戰中的主導性強度，甚至持續影響至2007年及2010年兩次聯合內閣的籌組困難(Rihoux et al., 2005:965; Hooghe and Deschouwer, 2011:635-636)。因此，我們不能說法蘭德斯集團黨被判決違法議題不重要，但至少絕非是影響該次選舉唯一且重要的議題，也無法說明該項判決與法蘭德斯集團黨得票率之間是否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反而是該項判決，更加印證法蘭德斯集團黨是種族主義色彩濃厚、強烈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長遠來說對其形象與聲譽有不良的影響，不利其參與聯合政府、分享政治權力，並且一旦有相類似性議題主張的替代性民主政黨出現，更加不利其未來在選舉上的競爭。

#### 四、「防疫線」產生的弔詭現象

法蘭德斯集團黨在1987年國會選舉中突破法蘭德斯3%得票率，在1988年地方選舉再獲安特衛普市的17.5%的得票率，極右翼反移民政黨接連在選舉中大有斬獲，引起政府的



高度關注。1989 年特別設置一位皇家特派員 (Royal Commissioner) 的高階官員，希望能給政府提供建議，化解移民者和土生土長比利時人之間的緊張關係。1994 年成立永久的「反種族主義與促進機會平等中心」，即是該特派員政策建議具體成果之一。此外，1989 年 5 月 10 日由荷語綠黨和荷語社會黨提議，由法蘭德斯 5 個政黨對法蘭德斯集團黨成立「防疫線」，拒絕與法蘭德斯集團黨有任何的合作，但並未獲中右翼政黨的完全遵守 (Jacobs and Swyngedouw, 2002:331-333)。

1991 年國會選舉，法蘭德斯集團黨獲法蘭德斯的 10.4% 得票率，翌年 6 月 Dewinter 正式出版《70 點政綱》。民主政黨意識到再不採取積極作為，難以遏止民粹極右翼政黨反移民的囂張氣燄，1992 年 11 月 19 日所有民主政黨於國會集會，正式簽署協議對法蘭德斯集團黨設下「防疫線」 (*cordon sanitaire*)；他們一致同意不再和法蘭德斯集團黨合作，包括選舉場域（沒有選舉結盟、沒有聯合記者會或聲明）、議會場域（沒有聯合立法活動或投票協議，不支持該黨所發起的決議）及行政場域（沒有政府的聯合），使法蘭德斯集團黨無法發揮任何政策影響力 (De Lange and Akkerman, 2012:40)。而「防疫線」的具體落實則是延續到現今。

透過政黨「防疫線」的聯合抵制、圍堵，法蘭德斯集團黨是否還能繼續發展？該黨內部人士對於「防疫線」的反映又是如何？根據學者的早期研究，法蘭德斯集團黨在「防疫線」之下是能夠壯大發展的，由於受到民主政黨的聯合排擠，民粹式政黨遠離權力誘惑，反而能促使政黨內部更加團結，提升政黨的道德高度，也提供民粹政黨藉口去動員民眾反對建制政黨的「不民主式排他」。黨主席 Karel Dillen 在 1991 年的國會選舉前，曾表示「我們拒絕任何法蘭德斯的讓步；我們拒絕把清水放入酒中；我們拒絕出賣政綱去交換部長職位；我們拒絕出賣原則去交換任何東西。你們是否希望在每



個關鍵點都要有一個真正的反對黨？那就請投法蘭德斯集團黨一票。」(Pauwels, 2014:111; Moufahim and Humphreys, 2015:93)。對於政治混亂、經濟衰敗、社會亂象、人們的自私自利，法蘭德斯集團黨表示願意扮演一個稱職的反對黨，去監督其他政黨、導向正確的公共政策，特別是針對移民問題(Swyngedouw and Ivaldi, 2001:13-14)。黨主席 Karel Dillen 和其他強硬派份子認為，「防疫線」的封鎖及對政黨的孤立，正好可確保政黨純潔度，以避免和自身原則做妥協，該黨與權力隔絕則似乎貢獻它早期在選舉上的成功。

「防疫線」作為一個選舉機會，剛開始在法蘭德斯集團黨是受到歡迎的，但也不是每個黨內人士都全心擁抱作為一個反對黨的角色。在安特衛普地方選舉就斷斷續續地提到「如何贏得職位的策略」之問題。這在 1994 年提過一次，<sup>7</sup>2000 年的選舉再度被提起。在 2000 年議會選舉前的準備階段，Dewinter 表示「假如選民希望的話，法蘭德斯集團黨則是準備好要承擔治理的能力。法蘭德斯集團黨不是永遠的反對黨，不是如同媒體及傳統政黨把我們所認定的那樣。法蘭德斯集團黨熱切地要去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我們已準備好了。」同時，在政黨的宣傳小冊子「對法蘭德斯集團黨的 10 點偏見」(10 preconceptions about the Vlaams Blok)，提出對該黨有偏見的反駁，其中有一章清楚提及要承擔政治責任。它很清楚說到，該黨在某些情況下，準備要進入聯合政府，但並非是不惜代價；它沒有進入聯合政府，是其他政黨因為「防疫線」予以拒絕(Coffé, 2005a:212; Lucardie et al., 2016:217)。

---

<sup>7</sup> 1982 年法蘭德斯集團黨首次參與安特衛普市的地方選舉，得票率為 5.2%；到了 1988 年時，已從原先最小黨躍升為第 3 大黨，得票率為 17.5%；到了 1994 年的選舉時，則成為該市的最大黨，得票率為 28%(Swyngedouw, 2000:127)。



2004 年地區選舉法蘭德斯集團黨所獲選票來到歷史高點。對於即將到來的 2006 年地方選舉，Dewinter 動念想競選安特衛普市市長，該市是法蘭德斯地區第一大城市，也是支持該黨選票的主要大本營，更是 Dewinter 自己的選區。選舉結果法蘭德斯集團黨贏得 33.5% 的選票，僅次於社會黨的 35.5%，大有組成聯合政府的本錢，Dewinter 也積極爭取。但其他民主政黨基於「防疫線」的共同立場，即便政黨是分屬意識型態的左、右翼兩側，最後仍組成 5 黨聯合政府，包括基民黨、新法蘭德斯聯盟、綠黨、自由黨與社會黨，唯獨排除法蘭德斯集團黨。2004 年的地區選舉、2006 年的安特衛普市選舉，法蘭德斯集團（或利益）黨都有亮眼表現，位居第 2 大黨的位置，然而最後在聯合政府組成過程中，完全受到排斥，這對法蘭德斯集團（或利益）黨長遠發展來看相當不利，因為這說明了該黨在民主政黨的聯合抵制下，投給該黨的選票幾乎等同於廢票，是不會有任何作用，更不會有任何政策兌現的可能性。法蘭德斯集團黨在 2004 年的選票高峰點後，自此政黨支持率一路往下滑到 2014 年 3 合 1 選舉的谷底。

根據學者對法蘭德斯利益黨在 2009 年地區及歐洲議會選舉中，為何會毫無預期選票大幅滑落的研究，發現失業、移民威脅、政治不信任、意識型態、領導與組織都不能解釋真正下降的原因。經深入探討不同選民的背景與態度後發現，自由主義者直接民主黨(LDD)和法蘭德斯利益黨都有民粹主義的特質，因此選民態度傾向反移民態度與政治不信任者會有 8% 最後改投前者；新法蘭德斯聯盟則和法蘭德斯利益黨都主張法蘭德斯民族主義，因此有 15% 最後改支持前者 (Pauwels, 2011a:78)。當法蘭德斯集團黨失去獨佔議題的本事，替代性的民主選擇機會出現，民眾就會去思考民意該如何有效被反映，手中的選票如何發揮極大化效應，棄保策略的投票行為就容易發生。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成立了 30



年，卻連年被民主政黨的「防疫線」阻擋在聯合政府之外，成為名符其實永遠的反對黨，選民在不想浪費手中選票的考量下，改投自由主義者直接民主黨或新法蘭德斯聯盟，造成法蘭德斯利益黨在 2009 年選票大幅跌落。

最初成立「防疫線」，是因為要反對法蘭德斯集團黨的種族歧視主義及維護民主體制。然而，2004 年地區選舉後，法蘭德斯集團黨爭取加入聯合政府，但因政黨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加上民主政黨彼此之間的「防疫線」協議，最後獨漏法蘭德斯利益黨無法加入；該黨對於被排擠的回應態度是：「我們願意參與，但其他政黨拒絕與我們合作，並且使數十萬張選票遭到冷落」(Coffé, 2005a:212)。對於民主國家與政黨以維護民主之名，用聯合壟斷方式排擠特定政黨，壓制經由民主方式產生的民意，則招徠不民主的批評。再以 2006 年安特衛普市長選舉為例，為排擠 33.5%得票率的第 2 大政黨，意識型態分居左、右兩翼的政黨被迫共組「彩虹聯盟」，模糊了建制政黨之間的意識型態差異性，坐實民粹極右翼政黨對建制政黨的批評，認為後者是一群腐敗菁英只有權力、沒有理念的結合。

另一方面，「防疫線」的設立是要將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排除在地方、地區及全國層級的行政部門，以限制該政黨的政策影響力，進而限縮極右翼種族主義思想的擴散與影響。然而，「防疫線」同時也因此限制了建制政黨本身，限制它們針對移民及融合等議題改變立場的可能性。假如民主建制政黨體察民意想改變政策立場，準備複製或接納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的（部分）政策或看法，它們將會失去採取「防疫線」的合法性權威。但堅持政治上「朋友—敵人」的二分法區隔，那又和具包容性、以多元主義為基礎的自由民主政治相衝突。因此，比利時建制政黨決定要藉由「防疫線」排除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對自由的民主政治品質產生了矛盾的效果。



## 五、代結語：法蘭德斯利益黨的逆襲與困境

自從學者(Pauwels, 2011a)針對法蘭德斯利益黨在 2009 年選舉失利的研究發表後，法蘭德斯利益黨的黨內派系分裂、與新法蘭德斯聯盟之間的選舉競爭，以及在「防疫線」圍堵下法蘭德斯利益黨成為永遠的反對黨，民眾極可能採策略投票棄該黨改投其他，這幾乎已成近年來多數學者解釋法蘭德斯利益黨逐漸沒落的主要原因。

2018 年底新法蘭德斯聯盟退出政府執政聯盟，反對總理簽署《移民問題全球契約》，除了該《契約》內容與政黨立場相違外，一般認為法蘭德斯利益黨在 2018 年的地區選舉選票上揚，法蘭德斯反移民氛圍有上昇趨勢，如果新法蘭德斯聯盟不針對反移民政策採取堅定立場，2019 年的選情可能會有不利影響。儘管新法蘭德斯聯盟已有所預感，但 5 月實際開票結果公布，法蘭德斯利益黨竄升到法蘭德斯第 2 大黨、全國第 3 大黨仍引起各界詫異。

在相關投票取向與態度調查的數據公布前，以下僅先針對法蘭德斯利益黨再興的可能原因做分析。第一，政黨人事與策略的調整。現任黨主席 Tom Van Grieken 於 2014 年接任黨主席，當時他才 27 歲，亟努力淡化政黨極右翼形象，希望接近政治權力、克服「防疫線」的排擠(Pauwels and Van Haute, 2017)，善用新科技直接訴諸民眾、動員民眾，傾聽年輕人的想法並重用年輕人，該黨本屆當選為國會議員的政治明星 Dries Van Langenhove 就只有 26 歲，希望透過年輕人的認同與加入，給政黨帶來新的朝氣、活力與希望。第二，投入龐大資源於社群媒體的行銷與動員。政黨平日就利用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及 Twitter 等社群媒體，接觸民眾、訴諸民眾政黨理念，據媒體估計選前 3 個月光在 Facebook





及Instagram就投入 40 萬歐元做競選廣告，<sup>8</sup>相較而言第一大黨新法蘭德斯聯盟在Google及Facebook投入的競選廣告經費還不到其半數；廣告效益亦相當驚人，Van Grieken在選前最後一周於Facebook的 20 秒反移民廣告，超過 100 萬Facebook使用者點閱瀏覽，其中年齡低於 34 歲以下的超過半數，接近 70%是男性，也就是說法蘭德斯利益黨在開發年輕選民有不錯成績(Cerulus, 2019)。

第三，恐攻事件頻傳，國際情勢改變，導致反移民、反伊斯蘭教氛圍高漲(Jamin, 2019)，整體大環境有利法蘭德斯利益黨的競選。2015 年 11 月法國巴黎發生恐攻襲擊事件，造成 127 人當場遇難，8 名嫌犯中有 3 位來自布魯塞爾；2016 年 3 月布魯塞爾機場發生連續爆炸案，3 名自殺炸彈客引爆造成 30 多人死亡、300 多人受傷，是比利時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恐攻事件。過去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把穆斯林移民和犯罪劃上等號，或許民眾認為那是民粹極右翼政黨的偏見或選舉伎倆，然而 3 年前發生於比利時境內的事件則是讓法蘭德斯人記憶猶新。2016 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2017 年上任後一連串限制 7 個穆斯林居多國家的人民入境；2019 年 5 月初法國國民聯盟（RN；前身為民族陣線 FN）主席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到布魯塞爾幫法蘭德斯利益黨助選、拉票，她批評新法蘭德斯聯盟掌握權力後，沒有為反移民採取積極的行動，不值得信賴(Galindo, 2019)。當時國內、外環境與氛圍都對反移民的法蘭德斯利益黨形成有利的選舉條件。

第四，替代性的民主選擇政黨有執政包袱。新法蘭德斯聯盟自 2010 年國會大選後就一直是全國最大黨，然而 2010~2011 年聯合政府組成談判 541 天，最後新法蘭德斯聯

---

<sup>8</sup>據估計本次選舉法蘭德斯利益黨總花費約 320 萬歐元，最大黨新法蘭德斯聯盟則約 580 萬歐元。2019 年 8 月 22 日，取自 <https://www.brusselstimes.com/all-news/belgium-all-news/64843/vlaams-belang-spent-e-3-2-million-to-finance-mays-eu-campaign/>.



盟未加入聯合政府，而是選擇作為在野黨，以站在維護法蘭德斯利益的政治道德高度。然而，2014 年聯合政府新法蘭德斯聯盟雖未取得最後組閣權，但選擇加入聯合政府運作，並分配到數個重要部長職位，一直到 2018 年才退出執政聯盟。聯合政府執政成績的好壞，新法蘭德斯聯盟都得概括承受，因此當極右翼政黨批評政府對於反移民作為不足時，新法蘭德斯聯盟是無法脫離干係的。原本冀望新法蘭德斯聯盟能夠採取積極作為，遏止移民泛濫及其引起相關問題的民粹極右翼政黨支持者，很可能在失望之餘再回頭給法蘭德斯利益黨機會。

2019 年 5 月 26 日當晚 3 合 1 選舉有初步結果時，新法蘭德斯聯盟主席 De Wever 即表示：為了形成多數組成法蘭德斯地區政府，他會邀請所有政黨來談一談；他並沒有排斥法蘭德斯利益黨。荷語自由黨則是立即表示，絕不與法蘭德斯利益黨一起合作，因為價值觀衝突。翌日，法蘭德斯利益黨主席則表示，願意盡一切努力打破「防疫線」，以免辜負選民的付託。後來荷語基民黨、荷語社會黨也紛紛表態，與法蘭德斯利益黨價值觀不同，「防疫線」不合作立場並未鬆動。也就是新法蘭德斯聯盟願邀請法蘭德斯利益黨參與聯合政府，兩黨主席並私下會面商談，但傳統三大黨不願加入，導致兩右翼民族主義政黨議席未過半；至於改選前的地區政府係由新法蘭德斯聯盟、荷語自由黨及荷語基民黨共同組成，但此次選舉 3 個政黨選票都衰退，以致 3 個政黨聯合的議席數雖過半數，但若再次組閣免不了是「失敗者聯盟」之譏。新法蘭德斯聯盟經過數月的各種努力，最後還是維持舊的搭配組合，於 10 月 2 日和荷語自由黨、荷語基民黨共組法蘭德斯地區政府。

在達成地區政府組成前的幾個月，法蘭德斯利益黨一反往年常態，對於國王的召見、聯合政府的組成談判、媒體前的友善態度，一律不排斥的配合，真心想要打破實施 30 年



的「防疫線」。連最後可能再度排斥法蘭德斯利益黨的風聲走漏時，該黨支持者還立刻到 De Wever 寓所外掛布條「別忘了有 81 萬張選票！」（那正是法蘭德斯利益黨的得票數），嘗試給新法蘭德斯聯盟壓力，希望不要再棄法蘭德斯利益黨而去，然而最後事與願違。

民粹極右翼反移民的堅定立場，的確給了法蘭德斯利益（或集團）黨壯大的機會，但也因為旗幟鮮明有了種族主義偏見的不光彩名聲，導致民主政黨可輕易拿出「防疫線」作為擋箭牌來排擠它，使得法蘭德斯利益黨未來要接近權力或進一步發展，都面臨重重的關卡與挑戰。



## 參考文獻

- 劉華宗 (2009)。〈比利時族群衝突與政治危機〉，《歐洲國際評論》，5，1-38。
- 劉華宗 (2017)。〈比利時的法蘭德斯分離運動〉，載於洪泉湖 (編著)，《當代歐洲民族運動》(頁 77-99)。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劉華宗 (2018)。〈比利時地區性政黨的興衰發展及其對法蘭德斯分離運動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36(1)，127-178。
- 劉華宗 (2019)。〈權力分享與解決比利時族群衝突的選舉制度設計〉，《理論與政策》，22(3)，71-91。
- Art, David. (2008). "The Organization Origins of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 The Case of Belgium." *Comparative Politics* 40(4), 421-440.
- Art, David. (2013).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Politics."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9(2), 127-137.
- Betz, Hans-Georg. (2002). "Conditions Favouring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In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pp. 197-21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illiet, Jaak and Hans De Witte. (1995). "Attitudinal Dispositions to Vote for a 'New' Extreme Right-Wing Party: The Case of 'Vlaams Blok'."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7(2), 181-202.
- Boonen, Joris and Marc Hooghe. (2014). "Do Nationalist Parties Shape or Follow Sub-National Identities? A Panel Analysis on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in the



- Flemish Region of Belgium, 2006-11.” *Nations & Nationalism* 20(1), 56-79.
- Bouveroux, Jos. (1998).“Nationalism in Present-Day Flanders.” In Kas Deprez and Louis Vos (Eds.)*Nationalism in Belgium: Shifting, Identities,1780-1995*(pp. 209-2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rems, Eva. (2006).“Belgium: The Vlaams Blok Political Party Convicted Indirectly of Rac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4), 702-711.
- Cerulus, Laurens. (2019).“Inside the Far Right’s Flemish Victory.” Retrived June 2, 2019, from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inside-the-far-rights-flemish-victory/>.
- Coffé, Hilde. (2005a).“The Adaptation of the Extreme Right’s Discourse: The Case of the Vlaams Blok.” *Eth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thics Network* 12 (2), 205-230.
- Coffé, Hilde. (2005b). “Do Individual Factors Explain the Different Success of the Two Belgian Extreme Right Parties.” *Acta Politica* 40(1), 74-93.
- De Cleen, Benjamin. (2013). “The Stage as an Arena of Political Struggle: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Vlaams Blok/Belang and the Flemish City Theatres.” In Ruth Wodak, Majid Khosravinik and Brigitte Mral (Eds.)*Right-Wing Populist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pp. 209-219).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De Cleen, Benjamin. (2016).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The Articul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Populism in the Rhetoric of the Flemish Vlaams Belang.” In Jérôme Jamin (Ed.) *Léxtrême droite en Europe*(pp.223-242). Bruxelles:



Bruylant.

- De Lange, Sarah L. and Tjitske Akkerman. (2012). “Populist Parties in Belgium: A Case of Hegemonic Liberal Democracy?” In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ds.)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reat or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pp. 27-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wns, James F. (2019). “Why Is the Far Right Losing Voters in Belgium.” Retrived Jan 22, 2019, from <https://www.fairobserver.com/region/europe/belgium-populism-far-right-politics-flemish-interest-news-18181/>.
- Duerr, Glen M. E. (2015). *Secessionis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Future of Flanders, Scotland, and Cataloni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Erk, Jan. (2005). “From Vlaams Blok to Vlaams Belang: The Belgian Far-Right Renames Itself.”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8(3), 493-502.
- Galindo, Gabriela. (2019). “Vlaams Belang and Marine Le Pen Woo Francophone Belgians.” Retrived May 6, 2019, from <https://www.brusselstimes.com/all-news/belgium-all-news/politics/56246/vlaams-belang-marine-le-pen-francophone-belgians-elections/>.
- Hooghe, Marc and Kris Deschouwer. (2011). “Veto Players and Electoral Reform in Belgiu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4(3), 626-643.
- Hooghe, Marc and Thomas de Vroome. (2015) “The Perception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Anti-Immigrant Sentiment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Belgiu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8(1), 38-56.
- Jacobs, Dirk and Marc Swyngedouw. (2002). “The



- Extreme-Right and Enfranchisement of Immigrants: Main Issues in the Public ‘Debate’ on Integration in Belg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3(3-4), 329-344.
- Jagers, Jan and Stefaan Walgrave. (2007). “Populism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yle: An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Discourse in Belgiu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6(3), 319-345.
- Jamin, Jérôme. (2019). “Belgium: The Far-Right at the Gates of Power?” Retrived June 4, 2019, from <https://progressivepost.eu/spotlights/belgium-the-far-right-at-the-gates-of-power>.
- Lucardie, Paul et al. (2016). “It Is Still a Long Way from Madou Square to Law Street: The Evolution of the Flemish Bloc.” In Tjitske Akkerman, Sarah L. de Lange and Matthijs Rooduijn (Eds.)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Into the Mainstream?* (pp. 208-224). New York: Routledge.
- Maddens, Bart and Istvan Hajnal. (2001). “Alternative Models of Issue Voting: The Case of the 1991 and 1995 Elections in Belgiu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9(3), 319-346.
- Martiniello, Marco. (2003). “Belgium’s Immigr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1), 225-232.
- Martiniello, Marco. (2012). “Belgium.” In Christian Joppke and F. Leslie Seidle (Eds.) *Immigrant Integration in Federal Countries* (pp. 58-77).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oufahim, Mona and Michael Humphreys. (2015). “Marketing an Extremist Ideology: The Vlaams Belang’ Nationalist



- Discourse.” In Alison Pullen and Carl Rhodes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thnicity,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pp. 85-99). New York: Routledge.
- Mudde, Cas. (2000). *The Ideology of the Extreme Righ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udde, Cas.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541-563.
- Mudde, Cas. (2013). “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 Wha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2(1), 1-19.
- Pauwels, Teun. (2011a). “Explaining the Strange Decline of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Vlaams Belang in Belgium: The Impact of Permanent Opposition.” *Acta Politica* 46(1), 60-82.
- Pauwels, Teun. (2011b). “Measuring Populism: A Quantitative Text Analysis of Party Literature in Belgium.”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1(1), 97-117.
- Pauwels, Teun. (2013). “Belgium: Decline of National Populism?” In Karsten Grabow and Florian Hartleb (Eds.) *Exposing the Demagogues: Right-Wing and National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pp.81-104). Brussels: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 Pauwels, Teun. (2014).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ing Belgium,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Routledge.
- Pauwels, Teun and Emilie van Haute. (2017). “Caught between Mainstreaming and Radicalisation: Tensions inside the Populist Vlaams Belang in Belgium.” Retrived August 22, 2019, from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7/01/11/tensions-ins>





ide-vlaams-belang-belgium/.

- Poznyak, Dmitriy et al. (2011).“The Dynamics of the Extreme Right Support: A Growth Curve Model of the Populist Vote in Flanders-Belgium in 1987-2007.” *Electoral Studies* 30(4), 672-688.
- Rihoux, Benoît et al. (2005).“Belgiu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4(7-8), 957-967.
- Rihoux, Benoît et al. (2014).“Belgiu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Political Data Yearbook* 53, 39-44.
- Stanley, Ben. (2008).“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3(1), 95-110.
- Schuermans, Nick and Filip De Maesschalck. (2010).“Fear of Crime as a Political Weapon: Explaining the Rise of Extreme Right Politics in the Flemish Countryside.”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1(3), 247-262.
- Swyngedouw, Marc. (1992).“National Elections in Belgium: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Flanders.” *Regional Politics and Politics* 2(3), 62-75.
- Swyngedouw, Marc. (2000) .“Belgium: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laams Blok and the City of Antwerp.” In Paul Hainsworth (E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eme Right: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pp. 121-143). London: Pinter.
- Swyngedouw, Marc and Gilles Ivaldi. (2001). “The Extreme Right Utopia in Belgium and France: The Ideology of the Flemish Vlaams Blok and the French Front National.”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4(3), 1-22.
- Van Haute, Emilie and Teun Pauwels. (2016). “The Vlaams Belang: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ynamics.” In Reinhard Heinisch and Oscar Mazzoleni



- (Eds.) *Understanding Populist Party Organisation: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pp. 49-77). Publisher: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57/978-1-137-58197-6\_3
- Van Haute, Emilie et al. (2018). “Sub-state Nationalism and Populism: The Cases of Vlaams Belang, New Flemish Alliance and DéFI in Belgium.”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6(6), 954-975.
- Van Kessel, Stijn. (2014). “The Populist Cat-Dog: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to Contemporary European Party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9(1), 99-118.
- Van Spanje, Joost. (2011). “The Wrong and the Righ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ti-Immigration’ and ‘Far Right’ Parti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6(3), 293-320.
- Walgrave, Stefaan and Knut De Swert. (2004). “The Making of the (Issues of the) Vlaams Blo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4), 479-500.

